

# 精准扶贫的理论框架与实践逻辑解析

## ——基于社会发展模型

杨帆<sup>a,b</sup>, 庄天慧<sup>b,c</sup>

(四川农业大学 a.管理学院, b.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 c.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摘要:**精准扶贫是一场涉及资源、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贫困治理和整体性社会发展与改革行动,需摒弃单一认知思维,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思路出发构建其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践行。基于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和社会发展模型,研究构建一个精准扶贫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阐释其实践逻辑,研究认为,只有资源、技术、制度和文化相辅相成、四位一体的作用,才能够在根本上确保脱贫攻坚目标的顺利实现。

**关键词:**精准扶贫;社会发展模型;理论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2-0037-07

### 一 引言

未来五年,精准扶贫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梦想中最艰巨的任务和最重要的工作。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强调,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sup>①</sup>。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坚决指出,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sup>②</sup>。当前,在党和国家精准扶贫的顶层意志已经牢固铸就,精准扶贫的政治压力已经层层传导,精准扶贫的基层实践已经全面展开的背景下,精准

脱贫取得了显著成效,仅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就从2014年的7017万人减少到5575万人,减少1442万人,贫困人口比2014年多减21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7.2%下降到5.7%<sup>③</sup>。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需看到,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剩余的贫困人口将是贫困程度越来越重、致贫原因多维交织、脱贫难度越来越大的贫困群体,实现如期脱贫的时间依然很紧、任务依然很重、范围依然很广,亟需在精准扶贫的理念创新和实践逻辑上寻求新的突破,从而为精准扶贫工作构建起一套全面科学的理论框架,更好地指导精准扶贫实践的推进。

目前,精准扶贫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精准扶贫的内涵<sup>[1-2]</sup>、过程<sup>[3-4]</sup>、机制<sup>[5-7]</sup>、影响因素<sup>[8]</sup>等方面,已有部分学者在总结实践经验基

收稿日期:2016-1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四省藏区多维贫困及其治理对策研究”(14XMZ006)、“推进西南民族地区森林碳汇扶贫的政策研究”(15BJY093);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农村精准扶贫创新研究”团队(2015年—2017年)计划项目;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青年项目(博士专项)“四川藏区多维贫困治理与精准脱贫研究”(CR1623)。

**作者简介:**杨帆(1987—),男,四川苍溪人,四川农业大学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助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多维贫困治理;

庄天慧(1964—),女,四川彭州人,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区域发展、农村反贫困。

基础上对精准扶贫展开了理论总结与提炼。刘解龙提出了精准扶贫理论创新的两大来源,一是借鉴传统相关理论,二是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准扶贫思想<sup>[9]</sup>。王宇等从精细化社会理论的视角探讨了精准扶贫的理论导向<sup>[10]</sup>。左停等从央地关系、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成本理论三种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进行了理论提炼与反思<sup>[11]</sup>。钟晓华<sup>[12]</sup>、虞崇胜和余扬<sup>[13]</sup>均从可行能力视角对农村精准扶贫展开理论预设,认为可行能力贫困观对贫困度量、贫困人口识别和反贫困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纵观这些研究,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从相应的理论高度和宽度搭建精准扶贫的理论分析框架,厘清其实践逻辑,从而为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在借鉴吸收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从整体的社会发展视角出发来探析精准扶贫的理论框架与实践逻辑,以期为中国农村精准扶贫提供科学全面的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 二 社会发展模型:一个精准扶贫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发展模型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性解释模型,用以解释社会体制如何在经济和“文化-制度”变量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演进发展,由著名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率先提出<sup>[14]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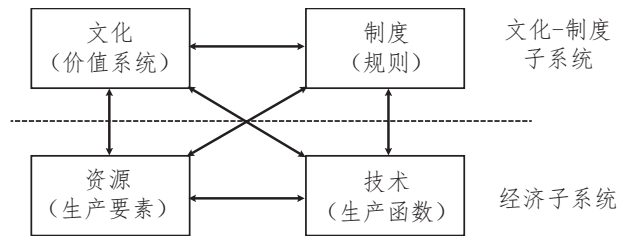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系统间的相互作用<sup>[4]第一章图 1-1</sup>

如图 1 所示,社会系统由经济子系统和“文化-制度”子系统构成。经济子系统由资源(生产要素)和技术(生产函数)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经济增长依靠人均资源禀赋增加和能使给定资源投入的产品增加的技术进步而实现。因此,一定的资源投入是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技术进步则是资源增长的有力支撑;同时,在有目的的资源利用活动中,技术创新能够实现技术进步。由资源禀赋和技术组成的经济子系统的生产力是以社会中的制度和制度为条件的。在该模型中,文化被狭义地定义为社会成员的价值体系;制度被定义为社会成员认同的规则,包括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文化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制度必须与一定时空范围内社会成员的价值体系相一致,才可能得到有效运行;制度的长期运行又可能强化或弱化社会成员的某些价值认知。

由社会发展模型可知,资源、技术、制度和文化在促进社会变迁与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是两两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又可能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资源投入在技术进步的支撑下促进资源增长;而在有目的的资源利用活动中,技术又可能实现改进。技术改进的同时,必须有相应的制度相配套;没有制度的约束,技术进步的效率增长可能在混乱与无序中被耗散。而制度在引进或创设过程中,又必须与人们所拥有的文化体系相适应,否则,制度将不会被遵守;制度的长期运行又可能促成社会成员某些文化认知的变迁。参见图 2。

在精准扶贫的理论分析框架中,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这一运行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即其发生的机理是怎样的。根据社会发展模型,有关扶贫的资源、技术、制度和制度和文化四者两两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促成了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质的飞跃与升华。其中,扶贫资源的供给是精准扶贫的物质前提,创新技术的发明和采用是精准扶贫的技术支撑,科学合理的制度供给与安排是精准扶贫的制度保障,贫困社区本土文化的破立再造和现代文化的引进融合是精准扶贫最终得以实现的文化根基。

## 三 基于社会发展模型的精准扶贫实践逻辑

### (一) 资源投入:精准扶贫的物质基础

一定的扶贫资源投入是精准扶贫的先决条件,也是精准脱贫的必要前提。扶贫资源既包括外部投入资源,也包括贫困对象自身拥有的资源。内外资源有效衔接、互相联动、优化配置,共同发挥着资源在精准扶贫中的物质基础性作用。

#### 1. 外部资源

外部扶贫资源主要包括资金、物资、信息、平台等,它们弥补了贫困对象自身资源禀赋不足的缺陷。在以往扶贫工作中,扶贫偏离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扶贫资源供求错位,扶贫资源没有精准投放到真正的贫困对象身上和脱贫最关键的部位与环节中,根本原因是没有对贫困对象的贫困状况实现精准识别。因此,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识别工作显得至关重要,它是确保扶贫后续工作精准的初始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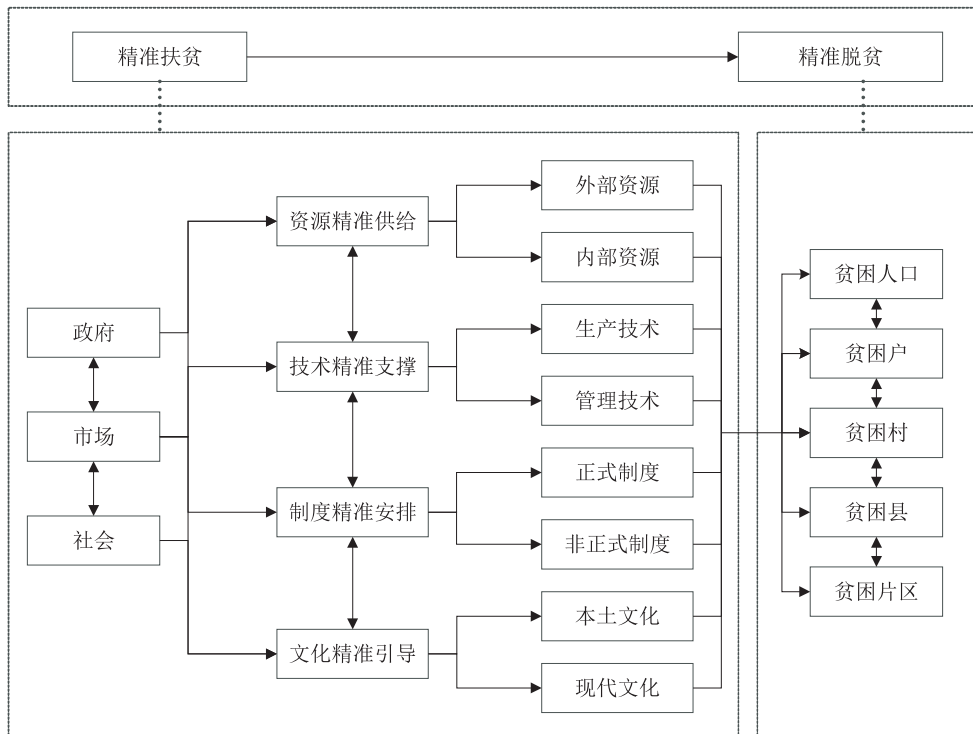


图 2.精准扶贫理论分析框架

在对贫困对象的范围、贫困深度、致贫原因等摸清底数基础上找准贫根,才可能实现外部扶贫资源在种类、数量和投放对象上的精准。一是必须尽量克服规模控制下的规模排斥以及识别过程中的主客观排斥。二是需要制定科学合理、易于操作的识别标准和识别流程。三要确立农户的主体性,调动其贫困识别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四是注重道德标准与道德尺度在精准识别中的克制使用,充分尊重识别对象的贫困属性,同时加强对识别标准附近“临界农户”的仔细甄别<sup>[1,15-16]</sup>。外部资源供给中,资金、物资等的直接供给固然能在短期内改善贫困对象的生存处境,但也可能形成依赖性,冲淡贫困对象脱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此,对资金、物资需采取有条件的转移支付供给方式,实现激励与约束并存。更重要的外部扶贫资源是信息和平台。贫困地区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容易形成信息孤岛,造成信息不对称,导致贫困对象的市场经济意识不足和市场判断失当,出现生产与消费供需断层。另外,市场交易平台的缺失,也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断档。为此,需抓紧建立农村市场交易信息平台,及时为贫困对象发布市场信息,提供市场交易平台,促进生产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并通过交易平台搭建降低交易费用,拉近生产与消费的距离,促进贫困对象增收脱贫。

## 2.内部资源

精准扶贫的内部资源是指贫困对象自身拥有的资源禀赋,包括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自然资源包括贫困对象自身拥有的土地以及所处自然环境的自然条件。要充分利用贫困对象拥有自然资源中的优势部分,发展现代农林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利用贫困地区丰富的气候、水力资源发展风能水电项目等,促进资源资产化,实现增收。人文资源是指贫困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累积形成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要充分依托贫困地区特有的人文资源,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业,支持贫困地区挖掘保护和开发利用红色、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积累。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欠缺,既是贫困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贫困产生的严重后果。在制度安排合理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多寡决定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获取的难易。因此,扶贫先扶智,要加大对贫困对象教育、培训、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在短期降低贫困对象的人力资本投入成本,在长期实现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阻断。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如机器、设备、生产用房、交通运输工具等。物质资

本是贫困对象资本拥有的又一短板。可适当探索低息出租、分期付款购买、补贴建造等形式,帮助贫困对象及时拥有必要的生产性物质资本,提供发展的原始动力。金融资本同样是贫困者资本拥有的短板。可在总结提炼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成功经验基础上,深化探索扩展贫困对象金融资本的创新做法,同时培养贫困对象的理财能力,提升其金融资本投资能力。社会资本则需在广泛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入中得到实现和强化,因此,贫困地区有序的社会活动应该得到组织和加强。

### 3. 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的互动

精准扶贫中,外部扶贫资源必须在包括贫困对象自身主观能动性在内的内部资源发生作用基础上,才可能发挥其功能。因此,贫困对象内部资源的调动至关重要,它为外部扶贫资源的作用发挥提供了能动的基础性可能。与此同时,外部扶贫资源弥补了贫困对象内部资源不足的缺陷,为贫困对象摆脱由资源不足形成的贫困恶性循环陷阱提供了可能。因此,扶贫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需有效衔接、联动整合,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出现对稀缺性扶贫资源的无谓浪费。这需要创新扶贫资源整合使用方式,实现扶贫资源由多头分散投放、管理向统筹集中分配、使用转变。

## (二) 技术创新:精准扶贫的技术支撑

正如罗默(Paul Romer)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强调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sup>[17]</sup>。技术进步不仅推动生产发展,而且能够通过更新社会生活内容,促进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发展,改变人们既有生活方式,加速现代文明建设,从而推动社会进步<sup>[18]411-413</sup>。扶贫资源投入,必须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技术支持体系支撑下,才可能实现优化产出和提高扶贫工作效率的作用。

### 1. 生产技术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贫困地区往往也是自然环境恶劣、生态脆弱的地区,地势陡峭、土地贫瘠、气候高寒、干旱缺水等因素,严重制约了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在自然条件约束下,依靠天然的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难以在产量产质提升上发挥更大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技术之源,技术是产业之源,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帮助贫困对象实现增产提质增收。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需将自主创

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模式相结合,同时根据创新难易程度对技术创新模式选择排列优先序。一般而言,模仿创新与合作创新的起点和要求较低,可在精准扶贫初期采用;但要真正摆脱贫困,仍需通过自主创新,掌握节约成本的核心技术。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实行科技研发激励,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同时结合不同贫困地区特点,研发具有地区针对性的农业生产技术。要加大技术创新实地调研力度,提高贫困对象参与度,听取贫困对象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与偏好,加大对贫困对象的实用技术培训力度,在技术普及过程中促进贫困对象思维观念、行为方式朝着有利于脱贫的方向转变。

### 2. 管理技术

管理技术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提高扶贫工作效率上。首先,精准扶贫在管理技术层面的一大创新是通过建档立卡,对贫困对象实现信息化、动态化管理。通过贫困识别,对贫困对象的家庭及个人基本情况、贫困情况、帮扶情况、脱贫情况登记造册,并录入信息化管理系统,实行动态监管,有效避免了以往扶贫因底数不清而造成的贫困对象排斥、扶贫资源供需错位等缺陷,提高了扶贫工作效率和扶贫脱贫绩效。其次,本次精准扶贫与以往扶贫开发工作的最大不同在于,将过程与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设定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精准脱贫总体目标,并将目标分阶段细化落实。同时将精准扶贫目标与基层扶贫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前景联系起来,实行扶贫工作绩效管理,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基层扶贫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矫正个别失当的工作态度,提高扶贫工作效率。此外,管理技术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还表现在通过对贫困对象的管理技术培训,提高其对自身资产、资本的管理能力和市场交易能力,从管理中要效益,以实现增收脱贫。

### 3. 生产技术和管 理技术的互动

生产技术和管 理技术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sup>[19]</sup>。生产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反过来对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产生巨大作用,促使管理技术提升,管理技术的发展又可能对技术创新产生激励效应;落后的管理技术必然损害生产技术创新和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而生产技术的落后则可以依靠管理技术的科学化弥补;先进的管理理念需要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予以支持才能够实现<sup>[20]</sup>。在精准扶贫过程

中,需要通过研发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贫困对象增收,同时依靠生产技术进步带动扶贫管理体制、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革新;与此同时,扶贫管理要为扶贫生产技术创新创设条件,规避落后僵化的管理思维对技术创新造成阻碍;在生产技术尚未得到突破之前,要树立从管理中要效益的思维,提高管理技术的生产力,实现管理技术与生产技术在精准扶贫中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

### (三)制度优化:精准扶贫的制度保障

从广义上讲,制度以及技术是文化的一部分。为了便于区分,根据速水佑次郎的界定,本文将文化狭义地定义为社会中人们的价值体系,而制度被定义为社会成员认同的规则。这与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对制度的界定基本趋同。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社会成员互动关系的约束<sup>[21]3</sup>。而贫困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制度因素。制度设计不合理,权利分配不公平,是造成区际之间、个体之间竞争条件和竞争能力异质,进而出现发展差距,导致贫困发生的重要原因<sup>[22]</sup>。因此,在精准扶贫实践过程中,摒弃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创设有利于贫困对象公平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制度,对精准扶贫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 1.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包括行为规范(norms of behavior)、惯例(conventions)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codes of conduct)<sup>[21]43-44</sup>。非正式制度在贫困社区集中体现为成文或不成文的村规民约等风俗习惯,非正式制度的相当部分是由文化遗传和生活习惯累积而成的,并非理性设计安排。人们遵循某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常常是出于习惯而非理性的计算,非正式制度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又根深蒂固的<sup>[23]</sup>。因此,合理利用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中蕴含的扶贫济困等积极因素对贫困对象加以引导,将对贫困识别、帮扶、退出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产生抑制作用,从而提高扶贫精度,降低扶贫工作开展难度。当然,非正式制度中对贫困产生强化功能、对反贫困产生阻碍作用的消极因素,应该被相应的非正式制度或正式制度所替代,如一些不合情理的人情往来习俗,应该被不涉或少涉物质金钱的社会交往活动所替代,但替代的过程必须是柔性的,需充分考虑贫困对象的接受认知规律。

#### 2.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sup>[21]55-56</sup>。有关精准扶贫的政治(和司法)规则,广泛地界定了精准扶贫的政治科层结构,包括决策结构、日常程序控制结构等,为精准扶贫提供了组织保障。精准扶贫对政治规则的最大创新在于,从扶贫的责任、权力、资金、任务到省进一步向下转移到县。责任、权力、资金、任务下沉,为基层扶贫机构和工作人员掌握扶贫主动权,提供了政治规则保障。精准扶贫中的经济规则,主要作用是对产权的界定,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投入的设施农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需清晰界定其产权,为贫困对象从扶贫资产中获益奠定产权基础,扫除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和权力寻租(power rent-seeking)的经济规则障碍。精准扶贫中的契约,主要是指贫困对象参与市场交易的合同式契约。契约的订立,需建立在合同双方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贫困对象由于受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的限制,近乎天然地处于契约谈判的劣势地位。因此,一方面需加大对贫困对象的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需提高贫困对象组织化程度,增强贫困对象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能力。

#### 3.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互动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是制度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二者既对立统一,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形成的源泉,正式制度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性,并促使非正式制度成为解决复杂交换问题的可能方式;同时,正式制度也可能修正或替代非正式制度<sup>[23]</sup>。因此,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动,避免制度之间的不适与冲突,为精准扶贫服务。具体而言,非正式制度中有利于扶贫开发工作开展、有利于贫困对象脱贫的因素,需得到正式制度的强化、确认;非正式制度中阻碍扶贫工作开展、不利于贫困对象脱贫的因素,要通过正式制度的负向激励作用,弱化其功能的发挥。同时,与精准扶贫有关的正式制度创设,必须与贫困社区非正式制度相协调,不可采取“硬创设”的方式,造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割裂,产生不必要的意识与行为冲突。

#### (四)文化调适:精准扶贫的文化根基

正如被誉为波兰经济改革总设计师的政治家和

经济学家科勒德克所言,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时,科技发展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只有调整个人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价值观,才能解决主要问题<sup>[24][227]</sup>。科勒德克所指的指导价值观即文化。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 and 深远持久的,具有无形性和非强制性,它的影响力比制度缓慢但更持久稳定。

### 1. 本土文化

贫困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ty)是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墨西哥贫困的过程中率先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sup>[25]</sup>。贫困社区的本土文化往往具备贫困文化的性质。首先,贫困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而非反文化,必然具有正负两种功能。就其正功能而言,贫困文化中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相互同情支持、良心自觉意识、善于接受正确的规劝等是贫困文化中的积极成份<sup>[26]</sup>;就其负功能而言,贫困文化安于现状的特性,对贫困群体产生了“自我设限”作用,扼杀了贫困群体行动的欲望和潜能,使贫困群体丧失锐意革新的勇气和能力<sup>[27]</sup>。因此,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既要继承弘扬贫困社区本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又要摒弃改造其糟粕部分,实现立破并存、破立再造。其次,文化具有群体性。它不是个人的生存活动方式、个人的行为习惯或思维习惯等,贫困文化的群体性决定了贫困文化将以既有的文化特性培养传承贫困生产方式、行为、思维模式及价值观念,并通过这种代际传递使自身的延续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sup>[27]</sup>。因此,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在精准扶贫中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在下一代的学校教育中及早干预。从这一层面讲,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天然具备扶贫功能,不仅表现在人力资本培训方面,更表现在文化干预引导方面。

### 2. 现代文化

现代文化是指人们适应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文化,是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并建设现代价值、形成现代认同、弘扬现代精神的文化<sup>[28]</sup>。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要想摆脱贫困状态,最终需要在文化(价值系统)根基上摆脱贫困状态。通过对现代文化的引入,让贫困对象直观感受本土文化中落后部分对其摆脱贫

困的阻碍作用,进而适应、认同、融入、弘扬现代文化,能够实现本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平稳过渡。例如,在贫困社区,通过引入自来水、卫生厕所等现代文明生活设施,在提高贫困人口身体机能和健康水平的同时,也能够改变其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逐步养成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但是,现代文化引入过程中,需注意与本土文化的融合适应,要按照文化适应规律循序渐进地输入,并给予贫困对象充分的适应期,同时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切忌采用“休克疗法”,激进地输入现代文化,造成对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难以承受的文化冲击,扰乱本土文化生态,造成本土文化和外来现代文化的双重损失。

### 3. 本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互动

一方面,本土文化应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理解、接纳外来的现代优秀文化,并重新发现、认识、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外来优秀文化以异于本土文化的姿态出现时,不能表现得过于强势,应以客人的身份,寻求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切入点,避免二者间正面直接冲突,逐步修正本土文化的缺陷,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破立再造,引导本土文化发展完善,为精准扶贫筑牢文化根基<sup>[29]</sup>。

## 四 结论

基于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和社会发展模型,构建一个“资源、技术、制度和文化的两两互动、四位一体”的精准扶贫理论分析框架,并阐释其实践逻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精准扶贫是一场涉及资源、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贫困治理和整体性社会发展的改革行动,需摒弃单一认知思维和分析框架,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思路出发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践行。第二,在精准扶贫“资源、技术、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四者是两两互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层层递进的关系,资源是前提,技术是支撑,制度是保障,文化是根本,文化层面的继承、改造与弘扬是精准扶贫的最终落脚点,只有文化思维中正确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只有贫困对象摒弃了贫困文化中负向功能对其行为方式的负面影响,贫困的消除才可能达到持续稳定状态。第三,在资源、技术、制度、文化内部,同样存在着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生产技术和管技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本土文化和外来现代文化的互动。因此,必须确保精准扶贫理论分析框架中的各模块在实践中的良性互动,才能确保精准扶贫工作

的顺利开展,从根本上推进脱贫攻坚目标的如期顺利实现。第四,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中,资源实现了增长,技术在有目的的扶贫活动中得到改进和提升,制度得到优化,文化得到批判性继承

和弘扬。因此,精准扶贫,既是一场扶贫开发活动,又是一场社会发展与改革行动,不仅有利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而且能够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优化与完善。

#### 注释:

- ①资料来源于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5-12/07/content\_5020963.htm。
- ②资料来源于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6-03/17/content\_5054992.htm。
- ③资料来源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3/01/c\_128764095.htm。

#### 参考文献:

- [1]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7-163.
- [2]庄天慧,杨帆,曾维忠.精准扶贫内涵及其与精准脱贫的辩证关系探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6-12.
- [3]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 [4]王介勇,陈玉福,严茂超.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289-295.
- [5]宫留记.政府主导下市场化扶贫机制的构建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精准扶贫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6,(5):154-162.
- [6]吴晓燕,赵普兵.农村精准扶贫中的协商:内容与机制——基于四川省南部县A村的观察[J].社会主义研究,2015,(6):102-110.
- [7]戴小文,曾维忠,庄天慧.循证实践:一种新的精准扶贫机制与方法学探讨[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31-137.
- [8]陈升,潘虹,陆静.精准扶贫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东中西部的案例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6,(9):88-93.
- [9]刘解龙.经济新常态中的精准扶贫理论与机制创新[J].湖南社会科学,2015,(4):156-159.
- [10]王宇,李博,左停.精准扶贫的理论导向与实践逻辑——基于精细社会理论的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16,(5):156-161.
- [11]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6-162.
- [12]钟晓华.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的理论预设、实现困境与完善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6,(8):69-76.
- [13]虞崇胜,余扬.提升可行能力:精准扶贫的政治哲学基础分析[J].行政论坛,2016,(1):22-25.
- [14]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15]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
- [16]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1-156.
- [17]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5):1002-1037.
- [18]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M].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9]叶国斌.生产技术与生产管理[J].通信技术,2000,(1):78-80.
- [20]周建.泰勒科学管理的范式观及其思想价值[J].科学学研究,2002,(5):510-516.
- [21]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 [22]黄少安,刘明宇.权利的不公平分配与农民的制度性贫困[J].制度经济研究,2005,(1):153-168.
- [23]崔万田,周晔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探析[J].教学与研究,2006,(8):42-48.
- [24]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21世纪政治经济学[M].龙云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 [25]LEWIS O. The culture of poverty[J]. *Scientific American*, 1966,(4):19-25.
- [26]张艳萍,徐晓暖.改善贫困文化强化社会支持的对策研究[J].大连干部学刊,2006,(8):39-41.
- [27]方清云.贫困文化理论对文化扶贫的启示及对策建议[J].广西民族研究,2012,(4):158-162.
- [28]牛汝极.试论“现代文化”的理论与实践[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14.
- [29]明海英,朱睿,张侨.外来文化应与本土文化相融合[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6-04(A2).

[责任编辑:钟秋波]